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 演變之研究

——兼論「彭德懷事件」之發展始末

共同科副教授 齊 茂 吉

第一節 韓戰對中共建軍的影響

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全中國大陸後，共軍也邁入新的建軍階段，這就是到底要建立什麼樣軍隊的問題。

由於中共政權建立之初，統治基礎然十分薄弱，無法有效控制全中國大陸，中共政權顯然並不穩固，尤其是撤退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蔣中正總統的領導下，隨時準備反攻大陸，實帶給中共莫大的壓力。雖然，當時美國並未採取支持中華民國的政策，可是，中共却對美國懷着高度的敵意，並視美國為頭號敵人。當時，毛澤東即提出警告說：「在這裏，我認爲有必要喚起人們的注意。這即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鑽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搞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港。只要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力量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充分估計到。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於被動的地位。」（註一）接着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上，毛澤東發表的開幕詞中明白指出了共軍的建軍方向和今後的任務，毛說：「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

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註二）

問題是，中國大陸經過多年的戰亂後，經濟凋敝，中共不可能獨力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因此毛澤東唯有向蘇聯求助，一九四九年七月毛發表那篇著名的「一面倒」演說，其動機實不難了解。接着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雙方結為同盟，此一條約包括了秘密協議，蘇聯允諾軍援中共，協助中共軍隊現代化。

在雙方結盟的初期，蘇聯軍援中共的程度與範圍，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以史大林多疑猜忌的個性來看，蘇聯顯然不急著協助中共軍隊現代化，這由日後入韓參戰的共軍所配備的武器可見一般。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後，當時中共並未派遣部隊直接參戰。可是在九月間，美軍成功登陸仁川後，麥克阿瑟將軍揮軍北上直逼鴨綠江之際，中共的反應立即呈現出非常激烈。九月卅日，周恩來公開對美國提出警告說：「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註三）十月廿五日，中共派兵大規模介入韓戰，參戰的共軍部隊配備的只是輕武器，與武裝鬭爭時期比較並無太大的差別，除了步槍以外，僅有少量的自動武器及為數甚微的大砲，中共也承認美軍始終具有「海、空優勢」，「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爭開始時，沒有一架飛機參與前線作戰，僅有數量很少的大砲……」（註四）由於美軍裝備擁有壓倒性的優勢，中共付出了相當慘重的傷亡代價，才將美軍逐回卅八度線以南，此後韓戰形勢也就呈現膠着的狀況，中共和美國雙方在卅八度線附近的區域僵持不下。（註五）

雖然外界很難精確評估韓戰對中共軍隊現代化有多大的影響，不過韓戰確實加快了中共軍隊現代化的腳步。值得注意的是，迄至一九五一年冬末，共軍在美軍的反擊下難以支撐時，史大林才決定軍援中共，這些先進武器才使共軍免於潰敗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共軍邁向現代化的里程碑。（註六）此後，蘇聯提供了難以估計的軍事援助，中共也開始了影響深遠的建軍新階段。共軍參戰之初只是單一步兵組成的軍隊，經過韓戰，共軍逐漸發展為多兵種的軍隊，在步兵的基礎上經建了空軍、海軍、防空軍、公安軍，以及砲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學兵等，此外也建立生產傳統武器的軍事工業體系。赫魯雪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中共軍火庫中所有的現代化武

器（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都是蘇聯製造的，或者是由我們的工程師、我們的研究機構提供的樣品和藍圖而仿製成。我們給了他們坦克、大砲、火箭、飛機、海軍和陸軍的武器。幾乎我們整個的國防工業任由他們使用。」（註七）不可否認的是，蘇聯的軍援確使中共軍隊脫胎換骨，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也指出說：「蘇聯和中共的國防合作，經由裝備轉移，顧問協助，最後創建整個國防工業，這是中共軍隊轉變為現代化防禦武力的主要因素。」（註八）難怪彭德懷在國防部長任內曾感激涕零地說：「……我要表示對於我們偉大盟邦蘇聯的感謝，因為蘇聯在供應軍事裝備和幫助我們建設國防工業方面，作了兄弟般的努力。」（註九）

必須指出的是，韓戰的教訓使中共高層不少領導者深深體認到，為了應付與日俱增的強權軍事挑戰，共軍不只是單單加速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即可，誠如約飛（Ellis Joffe）所說：「簡單地說，韓戰不僅給了中共一支幾乎新裝備的軍隊，而且韓戰可能至少在一些領導者心目中引起了嚴重的疑慮，那就是關於他們經驗中許多方面的持續效力問題。」（註十）例如，共軍首度發覺在朝鮮半島的戰場上，竟然無法施展在武裝鬭爭時期拿手的運動戰。雖然，共軍參戰初期，係採取「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陣地戰、敵後游擊戰相結合」的戰略方針（註十一），可是由於「朝鮮是一個狹長的半島，山地樹多，地勢狹窄，三面環海。」而「限制了我軍廣泛的機動」，此外「我軍出國作戰……我軍一切所需物資均須從祖國運來；加之敵空軍封鎖破壞，更增加了供應的困難，直接影響了我軍作戰的機動。」（註十二）這些特點再加上「我軍的裝備遠不如敵人」的缺點（註十三），中共也不得不承認：「……我軍想在短期內殲滅敵人重兵集團，將敵軍趕下海，亦不可能。」（註十四）由於共軍無法重施武裝鬭爭時期所擅長的運動戰來殲滅美軍，「因此，戰爭經過極其艱苦緊張和鬭爭之後，使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敵我雙方均採取了戰略防禦，而形成了史無前例的長期對峙的局面。」（註十五）於是，中共唯有將戰略方針轉變為「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方針（註十六），戰爭形式也由運動戰轉為陣地戰，首任「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在「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即清楚地指出：「英勇的朝中人民部隊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五日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期間，進行了五次攻勢作戰，把美國侵略軍從鴨綠江邊和圖門江邊趕回三十八度線以南，殲滅了敵軍十九萬餘人，其中包括美軍八萬多人。自此以後，朝中部隊即轉而採取了積極防禦的陣地戰，在橫貫朝鮮的二百五十公里戰線上構築了銅牆鐵壁般的縱

深的防禦陣地，不僅把戰線在三十八線防近穩定下來，而且進行了多次勝利的反擊，使敵軍遭受了更為嚴重的損失。」（註十七）

非常明顯的是，中共在武裝鬥爭時期由累積的戰爭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作戰原則，已無法適用於韓戰。基本上，共軍利用抗戰坐大的同時，毛澤東即已主張運動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曾針對抗日戰爭條件作更進一步分析，毛指出：「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裏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佔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佔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擴大活動的地盤。……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鬪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禦。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禦，在戰役和戰鬪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因此，在戰役和戰鬪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註十八）歸納起來，毛澤東主張採取的戰略方針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至於在戰役和戰鬪的作戰方針則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註十九），毛認為這種方針不僅「正規戰爭用得着，游擊戰爭也得着」（註二十）毛澤東明白指出：「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鬪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鬪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接着，毛強調：「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鬪的變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註二十一）

可是，以當時共軍的裝備和戰力而言，要以運動戰和日軍硬拼，無異是以卵擊石。綜觀抗戰發展始末，共軍唯一打過一場稍具規模的戰役，就是中共大肆渲染的「平型關大捷」，此一戰役是共軍配合國軍襲擊圍奪平型關的日軍坂垣師團，此一戰役國軍傷亡倍於共軍，然中共却以不實的宣傳將戰果攬為己有，日後彭德懷也不得不承認說：「平型關是一次完全的伏擊戰，是敵人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但是結果我們沒有能俘獲一個活日本兵，只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步槍。」（註二十二）已故的名學者郭華倫教授一針

見血地指出：「平型關戰役，如與滌滬、台兒莊、長沙等廿餘次大會戰相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但回顧八年抗戰，八路軍新四軍算得上對日作戰的，也僅僅是此一戰役。」（註二十三）由於抗戰之初，毛澤東即曾指示說：「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註二十四）因此，共軍利用抗戰趁機坐大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此一政策下，「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根據敵我各方面情況的分析，確定我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毛澤東同志把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上來，這是因為：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革命的武裝力量要戰勝強大的敵人，不應同敵人硬拼，否則必將使自己遭受嚴重的損失，使革命遭受嚴重的挫折。只有實行游擊戰爭，才能完全充分動員和高度發揮全民的力量，去同敵人進行鬭爭，才能在戰爭中壯大發展自己……」（註二十五）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所強調的運動戰，反而運用在武裝鬭爭時期來打擊國軍，「到了抗日戰爭末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我們的戰略方針從以游擊戰為主轉變為以運動戰為主。到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期特別是後期，我們的作戰已經發展到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且還包括對大城市的攻堅戰了。」（註二十六）

問題是，中共在朝鮮半島重施運動戰的故技時，却不靈光了，因為「敵人是高度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第一流軍隊，是十七個國家組成的聯合軍隊，它是現代化的裝備，是陸、海、空軍聯合作戰，各兵種的技術與協同動作熟練。特別是敵人掌握了制空權，對戰爭的影響很大。」（註二十七）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分析說：「在部隊思想灌輸中所引用的論據……清楚地反應了共軍的軍事理論……那就是曾在國共內戰中獲致成功的經驗。入韓參戰的部隊認為他們將會贏得勝利，正如同他們以前配備同樣的武器，運用同樣的戰術……而打過勝仗一樣……」然而，在一九五一年一月末，戰線往復移動。在比較狹長的朝鮮半島上作戰，中共軍隊首度發現遭遇到陣地戰和堅強的戰線。第八軍完全粉碎了中共試圖創造一種流動戰場的形勢，而在這種形勢下，共軍比較會利用游擊戰術……」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中期，中共改絃更張，原來打算將聯合國軍隊逐出朝鮮半島，代之而起的是中共希望能獲得有利的政治解決……顯然，毛澤東的持久戰論調已無法適用於目前的鬭爭，在狹長半島延綿不斷的陣線上，中共必須力戰一個擁有優勢武器和現代裝備的頑強敵人，在他們的軍事經驗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中，中共領導者首度發現缺乏海空軍是達成軍事目標的一項嚴重障礙。這種情形下，在中國疆域外打一場需要高度犧牲的持久戰，共軍作戰士氣無法無限期地維持下去。」（註二十八）毫無疑問地，山頭林立且帶有濃厚游擊習氣的共軍在朝鮮半島的戰場上嚐盡了現代戰爭的苦頭，戰後中共總結戰經驗時，因而強調說：「……朝鮮戰爭經驗非常可貴的，這對於我軍的建設，是有一定作用的。對學習蘇聯軍事經驗，是有幫助的，對今後戰爭，也會有一定參考價值。」（註二十九）

韓戰對於中共建軍無疑具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在蘇聯軍事援助下，共軍部隊制式武器逐漸達成標準化、規格化、一致化，而走向「全盤蘇化」；另一方面全面效法蘇聯先進經驗，一切「以俄為師」，並着手建立正規化的軍事體制。（註三十）

韓戰後東後，共軍在推動現代化的努力時，中共領導階層發生了一場紛爭，這就是關於國防現代化的速度問題。當時，共軍總參謀長粟裕，「訓練總監部」部長劉伯誠、「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葉劍英等人認為，美國總統艾森豪和國務卿杜勒斯提出了圍堵政策，美國和中華民國締結共同防衛協定，亞洲軍事聯盟網的建立，及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的金門危機期間，美國對中共施加核子威脅。這一系列發展顯示，美國極有可能對中共發動核子攻擊。為了應付這種威脅，粟、劉、葉等人建議擴大武器生產，增購蘇聯武器，並加強研究發展，以快速推動共軍之現代化。可是，國防部長彭德懷，及可能包括劉少奇、李先念等人認為，中共在蘇聯的核子傘庇護下，可以經由謹慎的外交手腕來化解美國對中共的攻擊。萬一無法消弭戰爭的危機，中共可以人民戰爭來對抗美國的核子攻擊，並擊敗美國入侵軍隊，而贏得最後的勝利。因此，彭德懷等人主張，沒有必要將經濟發展的資金轉用於國防戰備，這是不值得的，最好的方式仍然是由長期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來達成國防現代化的目標。（註三十一）此外，劉伯承及葉劍英等人也反對裁減軍隊員額。反之，彭德懷認為裁減軍隊員額，將可減少國防費用的支出，至於軍力問題，在必要時可以動員曾受過訓練的預備役軍人來補充。因此，彭德懷主張將節省下來的國防費用轉供經濟發展之用。（註三十二）

針對這場爭論，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係」，毛在這篇講話中專門談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毛主席：「……我們已經相當強，以後還要更加強，可靠的辦法是把軍政費用擺在一個適當的比例上，使軍政費用支出的比重，分幾個步驟，降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經濟建設費用，使經濟建設有更大

和更快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國防建設也能夠得到更大的進步。」（註三十三）由毛澤東的講話可以明顯發現，毛認為國防現代化確有加強必要，不過毛強調唯有在經濟發展高度成長的基礎上，國防建設才有發展可言。換句話說，在預算的分配方面，毛澤東顯然主張經濟發展優於國防現代化。事實上，「七屆三中全會」上，中共即已提出減少軍政費用的問題，可是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軍事費用佔中共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二，毛認為「這個比重太大了」，因此，毛主張：「第二個五年計畫應當想辦法把這個比重降低下來，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濟建設……」（註三十四）

毛澤東發表上述的講話顯然是政策性的，在這場爭論中，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居於上風，不過毛並未完全否定粟裕等人的看法，毛雖然明白表示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但是「國防不可不有」（註三十五），也就是不應放棄國防現代化的努力。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領導階層對於加強國防現代化方面的問題並無歧見，爭論的重點只是預算分配方面到底是孰重孰輕的問題而已。此外，這場爭論的衝突程度並未升高至所謂「路線鬭爭」或派系鬭爭的層次，沒有任何人因而遭到政治整肅。這場爭論在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後而告一段落，中共也開始降低軍事費用在總預算中的比重，彭德懷透露說：「……我國人民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需要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軍隊來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為着適當地照顧這兩方面的需要，國家決定在平時要認真節減國防費用和行政費用，這是十分正確的。根據這個決定，我國的軍事費用在國家支出中的比例，已經從一九五五年度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一，下降到一九五七年佔百分之十八點八五。」（註三十六）

不過，在這場爭論甫告平息之際，中共內部却正醞釀着一場更大的紛爭，這就是軍隊的角色問題。

第二節 中共軍事路線基本原則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其發展

關於中共軍隊的角色問題，首先必須探討中共軍事路線形成的歷史背景，歸納起來，中共軍事路線堅持兩大基本原則，一是黨指揮槍，一是軍隊具有多重功能性。

在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動」後，中共開始採取武裝鬭爭活動，這也是中共正式創建軍隊的肇始。接着在八月七日，召開「八七」緊急會議，確定了「通過暴動，奪取政權」的方針。（註三十七）此外，在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

中第八項，提出了改造編備軍隊，武裝工農革命軍，在軍中實行政治工作和黨代表制的建軍綱領。(註三十八)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緣由。(註三十九)此一時期正如毛所說：「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註四十)九月間，毛澤東發動的「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率領殘部逃竄至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進行整頓，這就是中共建軍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再度強調：「要和反動派鬭爭，就一定要有槍桿子。過去我們的失敗，就是吃了沒有槍桿子的虧。」(註四十一)為了掌握槍桿子，「毛澤東同志開始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在連以上各級設置黨代表，並且成立了黨「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同志擔任書記，於是，這支部隊開始完全處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註四十二)此外，為了促進部隊團結，決定在部隊中連以上各級設立「士兵委員會」，此一組織實質上仍是黨運用來控制軍隊的工具，軍官必須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批評甚至制裁，而且官兵的待遇也改成完全一樣，其目的就是在改善官兵關係，培養共患難、同生死的「革命」感情，這也是日後共軍引以為傲的「光榮傳統」及「革命傳統」。(註四十三)「三灣改編」後，中共樹立了黨指揮槍的傳統，日後毛澤東曾得意地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註四十四)可是，「三灣改編也只是從組織上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還是一個長期鬭爭的過程。」(註四十五)

那麼，中共要用軍隊來打天下的話，兵源的基礎是什麼呢？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間，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即已肯定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並認為農民將是中共「革命」的主力。(註四十六)日後，毛澤東又強調說：「中國的貧農，連同雇農在內，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的農民羣衆，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註四十七)不過直到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的主張才獲得中共的採納。(註四十八)會後，「兩湖秋收暴動」即是典型的農民暴動。接着「三灣改編」後，毛澤東率領紅軍進軍井岡山途中，在寧岡縣古城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這就是「古城會議」，「會議就建立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

鬭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的。如果沒有革命根據地，革命的武裝就會因失去了依托而成爲流動式的武裝，就不能和民衆凝成一體，就容易受到敵人的襲擊，土地革命也不能得到堅持和鞏固；如果沒有土地革命，就不能最充分地發動羣衆，不能從根本上壯大革命的武裝；如果不積極開展武裝鬭爭，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得到鞏固和擴大，土地革命就不能有效地進行，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也就不能保衛。」（註四十九）有鑑於此，會議決定：「在以寧崗爲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積極開展武裝鬭爭，實行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廣泛發動羣衆進行土地革命，創造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建立井崗山革命根據地。……」（註五十）此後，中共即以農村爲根據地，以農民爲主要兵源，展開武裝割據的奪權活動。

所以，毛澤東強調說：「因爲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佔據著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願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鬥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鍊自己的力量，並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鬭，那就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凶惡敵人，借以在長期戰鬭中逐步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註五十一）

毛澤東率領紅軍在井崗山落腳後，併吞了地方土匪王佐和土霸袁佐才的武力。迨至一九二八年四月間，朱德、陳毅率領紅軍到井崗山與毛部會師後，兩部合編爲紅四軍，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一九二九年一月間，井崗山失守，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往贛南閩西流竄，而開始產生一些問題。在井崗山時期，雖然已在部隊建立了黨組織和政治機構，但是「紅軍成份，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份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鬭，傷亡又大……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因此，「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一法」。（註五十二）可是，一離開井崗山後，「一直處於頻繁轉戰的環境中，沒有可靠的立足點，無法認真開展黨和軍隊的整頓工作。」（註五十三）此外，「在長期高度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的環境下，不僅紅軍中，即黨內也湧進了大量的農民。據一九二九年五月估計：全軍約四千人，黨員一千三百二十九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其中工人三百一十一人，佔百分之二十三點四，農民六百二十六人，佔百分之四十七。小商一百零六人，佔百分之八，學生一百九十二人，佔百分之十四，其他九十五人，佔百分之七。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共佔百分之七十，而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部隊成份中農民數量更大。紅軍主要成份又多是從封建軍閥部隊裏轉變過來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習慣，依然很濃厚地存在著。」（註五十四）這種思想和習慣，「必然大量反映到紅軍中。突出的是存在著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殘餘。如有的幹部對黨委、支部討論決定問題的制度不習慣，感到受約束，喜歡『長官說了算』。有的幹部認為軍隊只管打仗，喜歡『走州過府』，政權觀念薄弱，對建立蘇維埃，建立農民協會、建立游擊隊和農村中的黨組織，不關心或不大關心，不積極做羣衆工作。……部隊中打罵現象也比較嚴重，連長、排長打了戰士，過兩天開個士兵委員會，也可以打連長、排長的手板，還有打屁股的。部隊至閩粵贛邊，甚至採取槍斃逃兵的野蠻手段。」

（註五十五）

在這種環境中，紅四軍召開了「七大」，結果在會上，毛澤東沒有當選前委書記，而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非常失意，會後，即離開紅四軍，以養病為名前往閩西滯留。至於陳毅則離開蘇區轉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當時中共組織部長、軍委書記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在聽取陳的匯報後，於九月二十八日就「軍閥混亂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及前途以及戰略」等給紅四軍前委寫了近萬字的書面指示，這就是著名的「九月來信」，又稱「指示信」。（註五十六）此外，「在和陳毅面談中，周恩來以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名義指示他馬上返回閩西，把毛澤東請回來，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並說最好有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今後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註五十七）「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澤東同志在陳毅同志的陪同下，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到紅四軍主持工作。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長汀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註五十八）這就是中共建軍史上非常重要的「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通了「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簡稱為「古田會議決議」，此一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因此，「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並幫助羣衆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羣衆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註五十九）由「古田

會議」的決議案可以明顯發現，紅軍所擔任的任務不只是打仗而已，而且必須參加許多非軍事性的工作，這些工作均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軍隊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口號，就是在這時候提出來的。這句口號體現了軍事活動與政治工作的密切結合，互相作用的關係……」「那時候，部隊一方面實行武裝割據，進則主動打擊敵人；退則周旋隱蔽，避免打無把握的仗，等待時機，準備下一次打擊反革命。每到達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分散到以班、組為單位，到各村去發動羣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農會。寧岡、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帶，都是這樣地逐步建立了紅色政權，成了革命根據地。這樣，不但教育、鍛鍊了部隊，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係。」（註六十一）顯然，毛澤東試圖將紅軍建成一隻具有多重功能性的政治化軍隊。這也是紅軍發展為戰鬥隊、生產隊和工作隊的歷史背景。

由「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以來，中共軍事路線的基本原則已發展成型，一九五八年七月卅一日，當時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元帥發表紀念共軍建軍卅一周年的專文中強調說：「三灣改編的重要歷史意義，就在於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組織上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到紅四軍九次黨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毛澤東同志建軍的一套經驗，便基本總結起來，這就成了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三十多年來，一直對革命戰爭和軍隊的建設起著極其深刻久遠的影響。」（註六十二）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軍事路線並非完全出自毛澤東的構想，「古田會議決議」實基於「指示信」而擬訂的。周恩來在信中指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羣衆鬭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指示紅軍要克服單純軍事觀點，以免使紅軍的一切行動成為單純的軍事行動。此外，來信指出，紅軍發展的方向，應該向著羣衆鬭爭有發展可能的地方，使當地的革命鬭爭深入，若停滯不前，將減少紅軍的政治意義。來信並指出，紅軍的一切行動自然是政治的或軍事的，但絕不要忽略羣衆日常生活中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號，應該細心去了解羣衆生活的需要，從羣衆的日常生活引導到政治鬥爭以至武裝鬭爭，這種鬭爭才是羣衆所需要的，才不是單純軍事力量的發動，才不是少數個人的英勇硬幹，才會團結廣大羣衆在黨的周圍。（註六十三）「古田會議決議」正是根據這些指示，而具體規定紅軍的多重功能性任務。由此可見，周恩來對於中共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軍事路線的形成與發展所具有的影響作用，實不可忽視，不過西方學者却往往忽略周恩來的影響性。「『指示信』對開好古田會議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正是根據周恩來在『指示信』中提出的基本思想，結合紅四軍的具體情況，在朱德、陳毅的協助下，起草了古田會議決議。正如這個決議中所指出的：古田會議是『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但古田會議決議在很多方面又豐富和發展了『指示信』的內容。因此『指示信』和古田會議決議都是我黨歷史上建軍與建黨方面最早、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獻，對於我黨我軍的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註六十四）

基本上，在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上，中共領導階層並無異議。問題是，在軍隊的角色方面，毛澤東一向主張應擴散軍隊的功能，換句話說，軍隊不僅是戰鬥隊，而且也是生產隊及工作隊。一九四九年初，共軍席捲長江以北之際，毛澤東即已指示共軍「把軍隊變為工作隊」，「準備接收並管理大城市」。（註六十四）緊接著在十二月初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報告再度強調：「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同時「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當時毛澤東宣稱：「現在準備南下的五萬三千個幹部，對於不久將要被我們佔領的極其廣大的新地區來說，是很不夠用的，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化為工作隊。」（註六十五）中共佔據大陸初期，主要是靠共軍組織的「軍事管制委員會」來擔任地方行政工作。中共建立政權後，在全中國大陸一共設置「六大軍政委員會」，在這一組織中軍方擔任著支配性的角色。為了加強對於地方的控制，大批軍事幹部復員後轉至地方黨政部門擔任重要職務，軍方勢力也大量滲入地方黨政部門，尤其是在一九五五年期間，大批復員軍人返回農村地區後，這批人不僅成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骨幹（core cadres），而且在一些未建立黨組織的農村地區，也成為建立黨組織的核心（nucleus）。（註六十六）此一期間，共軍先後支援了「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及「農業合作化運動」。基本上，毛澤東在「關於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工作的指示」中，即已規定「共軍擔負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也是一支生產軍。」（註六十七）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間，「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我軍集體轉入生產建設的部隊已經有三十一個師另八個團，加上轉業幹部和復員的士兵已達五百萬人。」（註六十八）這一系列發展顯示，共軍仍然秉承「光榮傳統」，扮演著多重功能性的角色。

可是，在韓戰爆發後，共軍內部正有一股新興勢力崛起，這股勢力不少人曾經韓戰戰火的歷練，深感共軍現代化的急迫性。這股勢力除了共軍高層負責推動現代化的重要幹部外，還包括由新設立的正規軍事院校培養出來的專業幹部，這批幹部的成員主要有二，一是由部隊轉至院校進修的官兵，二是由民間招考入學的新生。這股新興勢力可以曾任「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的彭德懷為代表，彭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並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底出任中共首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認為，共軍不僅要從事現代化的努力，同時更應加緊建立正規化的軍事制度。因為唯有奠定正規化建軍的基礎，才能保證國防現代化的成功。彭德懷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上，提出「關於中國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報告時，強調說：「正規化的軍事制度，是現代化軍隊的重要條件。特別是我軍過去長期處於分散環境，各個部隊的軍事制度不完全統一，因此，在現代化建設中，強調正規化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彭明確地指出：「正規化就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制度、統一訓練和統一紀律」。因此，自彭德懷就任國防部長以來，即不遺餘力地推動正規化建軍，此外，並且積極地以軍事院校來培訓正規幹部，冀圖由「職業軍官團」來促進全軍的專業化，以達到現代化的標準。彭德懷在「八大」所提的報告即表現出這種強烈要求的傾向，彭指出說：「在改善軍隊技術裝備的同時，全軍展開了提高指揮能力和技術操作、提高政治覺悟和科學文化水平的正規訓練。同時軍隊有了現代化的裝備和組織編制以後，如果沒有堅強的指揮幹部和熟練的技術人員，則一切好好的裝備都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因此，這幾年來，軍官訓練和部隊訓練是我軍經常工作的中心。到目前為止，全軍已開辦了各種學院和學校，使大量經過戰爭鍛鍊的幹部得到了深造，現代戰爭規律和技術知識有了很大的提高。」（註七十）

非常明顯的是，在彭德懷當令下，學有專長的職業軍官勢必受到重用，具有院校學歷的幹部也將會逐漸得勢，可是這股勢力抬頭後，不可避免地會走向更專業化的道路，這種發展趨勢必然與共軍的「光榮傳統」發生矛盾。

由於毛澤東曾再三強調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註七十）為了維持黨對軍隊的控制，中共發展出一套嚴密的控制制度，將黨的組織全面滲入軍隊，黨委制經由政委制、政工制、政治部和黨的細胞所構成的階層組織來執行政治工作，以全盤掌握部隊。「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在實質上就是黨的工作，政治機關就是黨的工作機關。黨通過政治機關，領導全軍的政治思想工作，樹立全體軍人的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克服各種錯誤的思想和作風；領導部隊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政府的法律、法令；領導部隊黨的組織、青年團的組織和廣大官兵羣衆，自覺地堅決地執行上級命令、指示和完成軍隊中各項任務。」（註七十二）

在架構設計上，共軍領導結構的基本制度是「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部隊中的一切重大問題，例如上級的重要指示、命令、軍事、政治、後勤等工作的規劃、安排，幹部調配等等……都要召開黨委會進行民主討論……然後交給部隊軍政首長負責組織執行。」而「軍隊中各級共產黨的委員會，是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的。」「除了在緊急情況下，部隊首長可以按照自己的職權機斷處置外，都要召開黨委會……」「黨委對於工作做出決定之後，就要放手交給部隊首長去作，以發揮首長個人負責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黨委干預日常業務工作包辦一切的做法是不對的。」「在我軍中，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委員都是部隊的首長，共同負責領導部隊工作。同時，他們之間又有分工。對上級的命令、指示和同級黨委的決定，屬於軍事工作方面的，由軍事指揮員負責組織執行，屬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委員負責組織執行。」「如果沒有首長堅決負責的態度和強有力的及時指揮，複雜的合成軍隊在緊急的戰鬪情況中，就會引起行動的混亂，甚至招致戰鬪的不利；在工作中，也會造成遲緩和無人負責的現象。所以各級首長須在黨委的集體領導下，按照分工，積極主動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認為有了黨委的集體領導，就可以減輕首長責任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對的。」（註七十三）

基本上，所謂「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也就是根據「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所確立的建軍原則而發展出來的特殊領導制度，「我軍建軍之初，就在軍中設立了各級黨委和黨代表，古田會議明確了黨委是軍隊的領導中樞，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發展成爲黨委領導下，首長分工負責制，……」（註七十四）此一制度一方面確保黨對軍隊的控制，另一方面由黨來領導軍隊從事非軍事性的工作。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黨軍的工作往往重疊在一起，軍隊擔任工作隊所執行的任務，往往就是黨的工作範疇，此外，軍隊的重要幹部也常兼任地方黨委工作。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通過「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及調整各級組織間關係的決定」中規定：「各級黨委組織性質與成分必須改變，必須包括黨務、政府、軍隊中主要負責的黨員幹部。」（註七十五）而使軍方勢力經由制度化的過程而擴散至各級黨委組織，這一決定主要是將軍隊納入地方黨委的監督，然也伏下日後軍方反過來干涉地方黨委的因素。當時，在軍隊中，軍事指揮員和政委

大多是具有同樣經歷和背景的資深黨員，許多時候，軍事指揮員和政委也是同一人，因而黨在軍中的政治控制大體上沒有什麼問題。（註七十六）但是，此一制度在實際運作上也不是完全符合原先的構想，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澤東在「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中透露：「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註七十七）不過，在中共未統治中國大陸之前，由於在奪取政權的共同目標下，軍政首長之間並未產生任何嚴重的衝突，因為利害與共的休戚關係消弭了潛在危機。吉汀斯（John Gittings）認為，這種黨、軍領導階層的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使得雙方的衝突程度降至最低。（註七十八）

第三節 彭德懷正規化建軍政策的紛爭

一九四九年後，共軍開始邁向現代化的新建軍時期，「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也面臨了新的問題。當彭德懷大力推動正規化建軍的同時，新興的職業軍官勢力開始對於「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有了微辭。這些軍官認為，軍隊應將軍事任務列為第一優先，軍事訓練的比重應大幅升高，那麼，相對地必然要減低政治教育的比重和非軍事任務。這批軍官開始批評武裝鬥爭時期軍隊的主要特色——「黨委掛帥」、「政治決定一切」、「重思想、輕技術」。（註七十九）此外，「一九五三年，經過彭德懷審定頒發的內務條令……他在修改內務條令時，把營的政治教導員改為『受營長指導』，把連隊政治指導員和連長同為全連一切人員的直屬首長一句刪去。經過他的修改，這個條令便成為一個推行『一長制』的條令。」（註八十）這麼一來，政委及其轄下的政工幹部的權責首當其衝，軍隊的角色也將緊縮。此一時期，在一些技術兵種，例如裝甲兵、空軍，政委地位大為低落。裝甲兵部隊是正規化建軍後的新兵種，在裝甲兵的編制上，初時曾經有一個很長時間，沒有政治首長的編制。以後有了編制，又沒有政治首長的指揮車輛，因而在戰鬥演習中，政治首長不能上車，而對於戰鬥中的政治工作，幾乎無法進行。在空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曾透露說：「在我軍向現代化發展初期，在實際工作中也發生過一些問題。比如有些同志過份強調首長的決定作用，忽視黨委的集體領導，在一些表報上沒有政治委員簽署的位置，軍事演習中沒有政治委員的位置，指揮所裏

面沒有政治委員的位置等等。」（註八十一）這種現象在一般兵種，如步、砲、工兵也照樣存在，沒有政治首長的戰鬪指揮位置和活動事項，下達命令不要政治委員副署，把政治工作降為保障工作，戰術演習中，體現不出黨委集體領導以及政治工作等等；甚至有人提出，黨委集體領導不適合於正規化、現代化的要求，由於現代戰爭的突然性、複雜性，黨委制會妨害指揮的機動和集中。這一階段，毛澤東認為是一些單純軍事觀點、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人，企圖削弱和廢除黨委制。（註八十二）結果，黨在軍隊的組織功能也日漸衰退，而導致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間的衝突。（註八十三）不過，政委畢竟是黨委的當然書記，軍事首長只是黨委成員之一，當黨委成員的意見不一致時，黨委書記以其職務之便，當然可以左右甚至操縱黨委的決定，這也是軍、政首長產生矛盾的不可忽視因素。隨著正規化建軍的推展，軍、政首長間的衝突乃趨於表面化，這種現象在一九五五年到五八年期間顯得特別嚴重。（註八十四）

必須指出的是，彭懷德在國防部長任內所推動的正規化建軍，主要目的是促使軍隊邁向現代化，彭無意向黨在軍隊的至上權威挑戰，彭更無意扭轉「黨指揮槍」的傳統，彭在「八大」所提的報告中不僅重申：「堅決服從黨對軍隊的正確領導」，並且強調：「我軍的現代化並未改變人民軍隊的本質」。（註八十五）換句話說，彭德懷也無意拋棄共軍的「光榮傳統」。更何況，正規化是建立「五個統一」的領導體系（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制度、統一教育和統一紀律），應有助於黨對軍隊的控制。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在「八大」上的發言即指出：「全國解放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就逐步地從過去的舊階段，進入到現在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到來是以技術裝備的改善開始的，由此引起的是軍隊的指揮、編制、訓練、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變革。這是我軍建設的一個飛躍，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次巨大轉變。」「以往根據地時期所形成的分散領導的局面業已結束，一個統一集中的指揮體系業已建立，並且正在逐步地健全起來。……部隊的組織性紀律性加強了，游擊習氣大大減少了。」「在我軍歷史上存在很久的游擊習氣與山頭主義之被消滅，對於實現我軍正規化建設，達成領導上的高度統一與集中，有著重要的意義。」（註八十六）

問題是自韓戰以來，蘇聯大力軍援中共後，「以俄為師」乃蔚為時尚，共軍副總參謀長粟裕在一九五四年「八一建軍節」發表的專文中呼籲：「加速我軍的現代建設，必須認真學習，掌握技術，學習蘇聯的先進軍事科學，以蘇聯軍隊作為我們建軍的榜樣

……」（註八十七）彭德懷也再三強調：「向蘇聯學習，向蘇聯軍隊學習，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期以來堅定不移的方針。」（註八十八）有鑑於此，一九五三年，中共頒發的「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和「隊列條令」，「完全是外國條令的翻版」。（註八十九）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共頒佈的「軍官服役條例」中包含了細密的軍銜制，此一條例即以蘇聯模式為藍本，將一種階層嚴明的職級制度引進了中共軍隊，此一條例第一條即宣稱為了「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而制定此一條例。（註九十）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條例特色有二，一、未提及黨的地位，二、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者可直接授予中尉或上尉軍銜（參見此一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可是此一規定並不適用於政治軍官。換句話說，在軍中執行政治工作的政工幹部，在升遷及任用條件方面不如具有專業技術的軍事幹部。由於，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在「黨指揮槍」的傳統下，政工幹部的地位應不低於軍事幹部的地位，問題是此一條例實質上已貶低了政工幹部在軍中的地位，而導致政工系統的不滿。與此同時，又實行了義務兵制、薪金制、獎章制，而被合稱為「四大制度」。這一系列重要舉措不可避免地染上濃厚的俄式色彩，在共軍部隊推行這些制度後，對於官兵關係及軍民關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共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在一九五五年「八一建軍節」發表的專文中警告說：「目前部隊中，削弱我軍光榮傳統的現象是存在的，並且有些滋長，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傾向。」羅指出削弱這些「光榮傳統」的原因：「幾年來，我軍實行了許多重大制度的改革，不斷採取許多新措施。在這些新制度新措施實施時，在客觀上必然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會產生許多誤解……因此，有的同志要不是對新制度新措施產生抵觸情緒，就是否認過去一切，認為我軍的光榮傳統、建軍原則也都要改變了。幾年來，我們對於前一種傾向，也就是停滯不前、故步自封、拒絕學習新事物的傾向，曾進行過不斷的鬭爭……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後一種傾向正在滋長。他們不瞭解我軍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經過我軍幾十年流血鬭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是經過了無數次考驗的。實踐證明：有了它就可以取得勝利，離開它就要遭到失敗。這些原則是完全適合中國情況和我軍特點的，絕不能設想，丟棄這些，而另來一套。……我軍的光榮傳統不單在過去是必須的，而在現代化建設中更是必須的。如果我們脫離了這些原則，背棄了這些傳統，軍官如果與士兵分離，就會損害部隊的團結，就會削弱軍隊的戰鬥力。軍隊如果同人民分離，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就失去了精神上的

支持，堵塞了戰鬥力量的源泉。」（註九十一）

一年後，譚政在「八大」的發言中再度警告說：「……在轉變中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當我軍進入現代化的建設階段時，在人們中，對於建軍的目的、方針是有錯誤認識的，實際工作中也發生過偏向，並在某些問題上引起過思想上的混亂與人心的動盪不安。這種情形……雖然基本上已被糾正；但是，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在某些幹部中認識仍有不盡一致的地方，因此，錯誤的思想還經常流行，並不時形成偏向……」接著，譚政具體指出：「這些偏向，大致表現為如下各點：（一）忽視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傳統。近年來使人比較普遍地覺察到：官兵關係、上下關係之不若前些那樣親切融洽。……（二）忽視民主的作用。認為民主是妨礙集中的，是與正規化不相容的……却助長那種軍官高於一切，軍官懂得一切的妄自尊大的態度。（三）在領導方法上，往往強調行政命令，忽視思想工作，不走羣眾路線。認為領導機關的指示、計畫和首長的決定總歸是完整無缺的，只要照着執行即可。……（四）在學校教育與部隊訓練中，存在着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五）軍隊同人民的關係，同地方黨政的關係，較前疏遠。對人民羣眾的利益，不像過去那樣關心……」（註九十二）

譚政列舉的五個偏向顯然均涉及共軍的「光榮傳統」，換句話說，由「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以來所揭櫫的建軍精神正遭腐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譚政批判了師法蘇聯軍隊「先進經驗」的工作，譚政說：「在正規化建設中，對於軍人的職責、紀律……等要制定條令，所有官兵都要遵守這些條令，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為了使條令能體現出人民軍隊的特點，便於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有利內部的團結，在制定條令時，必須根據我軍的歷史特點與當前情況，實事求是地來進行研究。條令本身一定要體現民主精神和教育精神，並採取我軍所習慣了的許多組織形式和生活方式，不要機械地搬運外國的經驗。因為外國軍隊有他們自己的傳統，有些作法對於他們來說是習慣的，對於我們就不習慣，勉強去做，就顯得格格不入。」（註九十三）非常明顯的是，共軍政工系統察覺一味追求俄化的建軍措施，已經威脅到「光榮傳統」的延續，如何維護「光榮傳統」也就成爲一個引起紛爭的問題。此外更引人注目的是譚政露骨地批評了職業軍官，譚說：「有不少人把軍隊利用時間幫助人民生產與參加一定的社會活動，看成是額外負擔和妨礙訓練，認為只有關起門來訓練才叫訓練，幫助人民生產和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就不是訓練。這些人，口頭上贊成軍隊要聯繫人民、關心人民利益，跟人民羣眾同

呼吸、共命運；可是一到實際，他們就不贊成了，實際上他們是主張軍隊同人民隔離，同生產和社會鬥爭實踐相隔離的。」譚又指出這種趨向「是值得警惕的」，「發展下去……對於一個執行政治任務的革命軍隊來說，是極其不利的，是危險的。」（註九十四）當共軍政工系統針鋒相對地表現出不滿情緒的同時，在「八大」上，彭德懷仍然大聲疾呼：「我軍在現代化建設的開始，提出把蘇軍的一切先進經驗完全學到手的要求是正確的，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成績是很大的。毫無疑問，蘇軍的先進經驗仍為我軍今後學習的主要方向……我們努力學習蘇軍中的一切先進經驗，可以縮短摸索過程，少走彎路，迅速完成我軍的現代建設。」（註九十五）

基本上，共軍政工系統並不反對正規化建軍，因為高度統一與集中的領導體系應可強化黨指揮槍的效力，問題是伴隨着正規化而來的專業主義業已威脅到政工系統的職掌，進而削弱黨在軍隊的組織功能，而肇致矛盾，這場紛爭在「八大」上已現端倪，既然裂痕已生，衝突也告不可避免。「八大」後不久，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底，羅榮桓被解除了擔任已久的「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部長和「政治學院」院長等職。羅榮桓的去職，主因是對於全軍政治工作執行不力，而使共軍走上「專而不紅」的道路，接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劉伯承也被撤除了「訓練總監部」部長和「軍事學院」院長兩個重要職務，而劉正是彭德懷推動正規化建軍的支持者。羅榮桓、劉伯承相繼被解除重要軍職，顯示一股反對正規化建軍的暗流正惡化為整肅的行動。（註九十六）

為了糾正這些偏向，繼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共軍「總政治部」於一九五七年五月間召開了「全軍整風會議」，決定在全軍普遍展開整風運動，來解決軍隊內部矛盾。當時已升任「總政治部」主任譚政指出：「軍隊內部矛盾基本是兩個方面：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問題。」（註九十七）「解放軍報」則具體指出說：「官兵之間的矛盾。例如：有些軍官對士兵管教方式生硬粗暴，單純依靠行政命令辦事，甚至濫用職權，隨便處罰士兵；有些軍官不關心士兵的疾苦，不能與士兵同甘共苦，造成了官兵之間的隔閡。」「軍民之間的矛盾。例如軍隊建築工事、營房、機場、靶場等的計畫不適當，過多地佔用土地；長期住用民房，既不給房租，壞了又不修理；少數軍官和家屬在生活上鋪張浪費，找愛人不擇手段，不顧影響，引起一部分羣眾的不滿；有些同志居功驕傲，不尊重政府工作人員，體諒政府的困難不夠，責難較多，這些就造成了軍民之間的一些隔閡。」（註九十八）由一九五七年五月開始，整風運動主要是由揭發內部矛盾，並討論如

何處理內部矛盾，而進入整致階段。一九五八年一月間，共軍「總政治部」特地召開了全軍政工會議，以整改工作為中心議題，「會議着重地討論了幹部下放問題」（註九十九）會後掀起了「幹部下放」的運動，下放的幹部被要求「在實際的工作中和士兵羣衆打成一片，學習士兵的本領，與士兵同吃、同住、同操作。」（註一〇〇）此外又推動了隨軍家屬返鄉生產的措施，因為，「大批軍官家屬隨軍居住，嚴重影響部隊的建設、守備和訓練。對於軍官來說，家屬隨軍居住，勢必使軍官精力分散，從家屬的衣食住行到子女的撫育和教養，都須要軍官分心照顧。這就必然影響軍官訓練士兵和學習進修任務的完成。因此，動員隨軍軍官家屬還鄉生產，對於加強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增強官兵團結，密切軍民關係，將起着積極的作用。」（註一〇一）

站在彭德懷的立場，為了建立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專業軍隊，動員隨軍家屬返鄉生產的措施應有助於軍隊的建設；可是「幹部下放」運動勢將影響到辛苦建立起來的職業軍官團，而損傷到職業軍官的專業自主性，彭不可能贊成或支持「幹部下放」運動。

顯然，軍內形勢的發展已對彭德懷轉為不利，「總政治部」發動的全軍整風運動，就是準備將軍隊拉回到「革命」時期所樹立的「光榮傳統」領域內。接着由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又在北平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抨擊了師法蘇聯經驗的作法，毛批評說：「戰爭中按照蘇軍條令執行是不行的，還是攪自己的條令。不知軍事學院，訓練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做教條來背。如果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要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現在教條主義者主張抄蘇聯，請問蘇聯當時是抄誰的？」「八大」決議中有一節關於技術改革的問題，按照今天的發展情況來看，提得不安當，就是過份強調蘇聯的幫助。爭取蘇聯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還是自力更生，如果過份強調依靠蘇聯援助，請問蘇聯在當時又依靠誰來幫助呢？」因此毛指示說：「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以整風方式大鳴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經驗教訓，主要是教育全黨全軍，團結全黨全軍。」值得注意的是，在會上毛點名批判了「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毛說：「蕭克同志不僅有教條主義，而且是個軍閥主義，有資產階級思想，教條主義、封建主義。」「蕭克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有這樣的時機來開這樣的大會議，今天有了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教條主義的根子。」由於蕭

克是彭德懷的副手，也是協助彭推動正規化建軍的最力者之一，毛點名批蕭，實質上等於是間接批彭。更值得注意的是，毛在會上公開指出說：「我軍從開始就存在着兩條建軍路線的鬭爭。古田會議鬭了一下，但沒有說服有錯誤意見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還堅持着錯誤路線。」（註一〇二）毛的這種說法無異是指明，軍內已發生「路線鬭爭」，並暗示有人仍然「堅持着錯誤路線」，顯然毛已將鬭爭矛頭指向彭德懷。有鑑於此，這次會議「批判了所謂教條主義傾向和「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會後，在全軍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個人主義的鬭爭。」（註一〇三）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共軍「總政治部」正式發出指示，規定全軍的各級幹部，今後每年要下連當兵一個月，「藉以聯繫羣衆，鍛鍊自己……進一步發揚我軍官兵一致，上下一致，軍民一致的光榮傳統」，此一指示「要求下連當兵的幹部，應編入班、排建制，歸班、排長指揮；在連隊過黨、團組織生活；與士兵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註一〇四）共軍在全軍普遍推行「幹部下連」、「軍官當兵」的運動，其主要目的就是在改善官兵關係，重新提倡「革命」時期所標榜的同甘共苦的精神，來縮短實施「四大制度」後所造成的官兵差距，以促進部隊團結。當時「人民日報」指出：「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初創時期，毛主席就把官兵一致，確定為解放軍建軍的原則之一。幾十年來……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軍官是領導者，又生活在士兵羣衆之中，以普通軍人姿態出現，受羣衆的監督；士兵是被領導者，又有權參加管理，官兵政治平等。這種平等關係是保證軍隊打敗那些比我們強大得多的敵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同時又強調說：「我們提倡幹部下連當兵，就是要使幹部下到連隊去，過一過士兵生活，讓班、排長管一管，使他們真正能夠熟悉士兵的思想感情，體驗連隊的生活。這對打掉幹部的官氣，建立官兵之間真正平等的關係和培養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是絕不可少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人民日報」公開批判「正規化一度影響了官兵平等」，該文說：「前幾年，在「正規化」的口號下，部隊中就曾出現過一股資產階級特權思想的逆流。有人曾把我們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優良傳統，說成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不合乎正規化的要求」等等，加以反對。結果，我們的原有的官兵打成一片、平等相處的優良傳統被削弱了，不少軍官的官氣增加了；同士兵的聯繫減少了，官兵之間的關係「正規」了，感情却疏遠了。」（註一〇五）據估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為止，總共有十五萬名軍官，其中包括一百六十名將領，下放到連隊當兵。（註一〇六）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至於軍民關係方面，譚政在「八大」的發言即強調說：「應當指出，軍隊利用時間幫助人民，進行生產和參加一些社會活動，首先對軍隊有好處，可以加強軍隊人員的羣衆觀念與勞動觀念，並通過這種辦法去聯繫人民羣衆，密切軍民關係，加強軍隊同人民的團結」。(註一〇七)事實上，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初，「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即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和平時期，在不妨礙軍事任務的條件下，應有計畫地參加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幫助國家的建設工作。」(註一〇八)此外，在「八大」未召開前，一九五六年二月期間，共軍「總政治部」制定「關於軍隊參加和支援農業合作化運動及農業生產的實施方案」中規定：「各部隊、軍事機關和學校應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同駐地黨委、人民委員會聯繫，在一年內抽出若干勞動日，有計畫地參加當地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且做到按人數平均每人一年達到五個到七個義務勞動日。」(註一〇九)由此可知，在一九五六年期間，軍隊每一成員必須付出五個到七個義務勞動日，參加地方生產建設，來促進軍民關係。「八大」後，共軍政工系統開始醞釀增加義務勞動日的天數。一九五七年時，根據不完全的估計，共軍就作了兩千萬個義務勞動日。(註一一〇)至一九五八年時，共軍宣稱將以「三千萬個勞動日支援農業生產大躍進」。(註一一一)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軍委」也作出關於軍隊「每年以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參加生產」的決定，此一決定要求「軍隊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時間，參加地方各項建設事業，其餘時間經營內部的工農業生產。」(註一一二)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共軍義務勞動日的天數起碼增加了十倍以上。

此一期間，也就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同時，毛澤東又掀起了「全民皆兵」、「大辦民兵師」的運動。早在中共佔領大陸之初，將全中國大陸劃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及西南等六大軍區，各大軍區均根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兵制度，保衛地方秩序，建立國家動員基礎」的規定(註一一三)，而制定民兵條例，雖然內容規定未必全同，但其遵循的原則則是一致的。韓戰後，當共軍邁向正規化建軍時，民兵地位乃告低落，一九五三年，彭德懷針對「關於加強民兵建設的指示」，下令民兵按人口減少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並提出今後再不要強調普遍民兵制，接着，彭又決定「以預備役代替民兵，取消民兵，收繳槍枝，防止出問題。」(註一一四)迨至一九五五年「軍官服役條例」及「兵役法」先後頒佈後，預備役乃告制度化，彭顯然準備將常備役軍人及預備役軍人均納入正規化的軍事體制，

這也是民兵不被重視的背景。可是當毛澤東察覺正規化建軍已促使軍隊由「革命軍隊」轉變為「專業軍隊」時，以往毛再三標榜的「光榮傳統」及「建軍精神」正逐漸消失中，更重要的是，毛認為軍隊將會脫離其本人的掌握。因此，毛一方面利用政工系統的不滿情緒發動了全軍整風運動，另一方面又號召「大辦民兵師」，冀圖以「革命」時期的「建軍路線」重新建立一支抗衡正規軍的武裝力量。雖然，「在目前大辦民兵師運動中，人民解放軍都從人力物力等方面，大力協助地方黨委和地方軍事機關……」；（註一一五）但是，此一運動却是在地方黨委領導下，「各項民兵工作，都由工廠、礦山、學校、機關或人民公社黨委統一領導和安排……」（註一一六）顯然，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在此一運動中被閒置一旁，至於一手擬訂的預備役亦遭擱置不理。根據「軍官服役條例」及「兵役法」的規定，復員轉業軍人應轉為預備役，然在「大辦民兵師」運動中，這批為數達六百多萬的復員轉業軍人又成為民兵的骨幹，「……各地在組建民兵師工作中，都是依靠復員轉業軍人作骨幹，……平時依靠他們作為訓練民兵的教員，戰時就依靠他們作為組建部隊的基層幹部。」（註一一七）必須指出的是，這批復員轉業軍人中不少人曾經參加武裝鬥爭活動，也是毛澤東強調的「光榮傳統」、「革命傳統」下哺育出來的軍人，「絕大多數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和艱苦戰鬥考驗，政治覺悟較高，工作經驗較豐富，組織紀律性較強。」（註一一八）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這批軍人在政治立場上是符合「革命」標準的條件，毛將這批軍人作為組建民兵的基幹，實質上等於否定了彭德懷提出的預備役制度，並且攫奪了動員預備役軍人的權力。當時，毛澤東曾吹噓說：「一九五八年軍事工作有相當大的進展，一是大整風，二是官長下連隊當兵，三是參加生產，四是大辦民兵。」（註一一九）這一系列運動無疑是抑制職業軍官強調的專業主義取向，試圖重新建立一支由黨來控制的「革命軍隊」，並執行多重功能性的任務。換句話說，黨在軍中的工作機關——政工系統已無法容忍專業化日趨膨脹的壓力，而亟於謀取對策重攬正日漸消退的權責。不過，這一系列運動不僅無法消弭惡化中的衝突危機，反而激化了所謂「兩條路線」的白熱化鬭爭。

根據共軍「總政治部」的秘密文件「工作通訊」顯示，五〇年代末期黨在軍隊的基層組織正瀕於癱瘓。這種現象在技術兵種尤其明顯，例如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等這些兵種。「工作通訊」透露：「目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連隊（基層單位）沒有建立支部委員會，很多排沒有黨的小組，不少小的技術單位沒有黨員。」（註一二〇）此外，並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承認：「近幾年來由於領導上支部的組織建設重視不夠，嚴重地影響了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連隊黨員逐漸減少，整支前絕大多數班沒有黨員，多數排沒有黨小組，全軍約有七千個連隊雖有支部委員會，也因支部骨幹經常不在連隊，形同虛設。」（註一三二）以玩槍桿子起家的毛澤東當然無法坐視這股發展趨勢，毛認為彭德懷所推動的一系列建軍政策，不僅將貶低黨在軍隊的地位，而且將扭轉黨指揮槍的傳統，更令毛難以忍受的是將會削弱其對於槍桿子的控制。從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出任「中央軍委」主席以來，毛即一直試圖全面掌握軍隊，毛在中共黨內也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首倡者（註一三三），毛堅信唯有確實抓住槍桿子，才能維繫權位於不墜。因此，彭德懷推動的正規化建軍，所培養出來的一批專業化的職業軍官一旦得勢，可逆料的是，這股勢力將在軍隊中形成一股效忠彭德懷的力量，而對毛澤東構成一大權力挑戰。

在毛澤東的步步進逼下，彭德懷的地位已呈現不穩。針對彭德懷的失勢，詹克斯（Harlan W. Jencks）分析指出，彭得罪了政治委員這批人，這批人乃利用「大躍進」的機會，重新獲得失去的權力和威望。由於「幹部下連」運動使一批又一批的高級將領下放至連隊當兵，在這批職業軍事將領的心目中，彭德懷的信譽也開始減弱。加上，在「幹部下連」運動發動的那一個月（一九五八年九月），中蘇共軍事同盟的可靠性也產生了嚴重的問題。因為在臺海危機中，美國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對蔣中正總統提供了實質的援助，反之，蘇聯對北平的支持却顯得緩慢、謹慎和吝嗇。彭德懷一向與蘇聯盟邦保持親密一致的關係，蘇聯這種反應嚴重地削弱了彭的政治地位。此外，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片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決定不提供核子技術援助中共，詹克斯認為，蘇聯此舉事實上對彭德懷來說是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ace）（註一三四）。

薛爾曼（Franz Schurmann）認為，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爭論，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民兵問題。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垮臺後，彭被指責「妄圖取消地方武裝和民兵」。雖然在一九五八年夏天，毛澤東贏得了上風，將農民軍事化以外，並組建了民兵。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到七月間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却遭到相當強大的反對勢力，結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才作出決議。此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期間（按：「八屆六中全會」，也就是「武昌會議」），毛澤東遭到了一次失敗，毛辭去了「國家主席」一職，因此薛爾曼推測，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也就是彭德懷被整肅的期間，彭曾試圖取消組建民兵的程序。（註一三五）

如果薛爾曼的推測是合理的話，那麼彭德懷如何來扭轉這種不利的形勢呢？必須指出的是，一九五八年對中共而言，是建立政權後變化最大的一年，在這一年，毛澤東發動了「三面紅旗」運動，在全中國大陸推行人民公社。（註一三五）與此同時，毛澤東又號召「全民皆兵」、「大辦民兵師」，在「勞武結合」的原則下，組建亦工亦農亦兵的勞動大軍，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來強化對全中國大陸的高壓統治。站在彭德懷的立場，彭不僅不支持民兵計畫，而且對「三面紅旗」運動也有微詞。早在「武昌會議」召開前，彭德懷即已到過部分地區視察，直到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前，彭仍時常到一些地區從事實地調查，彭對毛澤東發動「三面紅旗」運動的不滿也公開溢於言辭。這也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呈送「意見書」的背景，照理而言，彭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主管的業務是軍事，而非經濟，然其「意見書」涉及的全是經濟建設的問題，也就是「大躍進」以來所產生的問題。雖然，日後鄧小平說：「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註一三六）但是，由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根據薛爾曼的推測而延伸出來的觀點，筆者認為，彭德懷希望扭轉「三面紅旗」運動，來中止民兵組建工作，以維持正規化的軍事體制，這才能鞏固彭個人的權位，以改變對其不利的形勢。顯然，彭德懷並未挽回頹勢，而在「廬山會議」上終於遭到整肅。

第四節 「廬山會議」中毛澤東、彭德懷的鬭爭

「廬山會議」召開的背景與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紅旗」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回顧「廬山會議」前一年的發展形勢，彭德懷始終不支持「三面紅旗」運動。那年八月，中共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後彭德懷對黃克誠說：「這次會議你也出席了，一些現象你也看了，部分同志認為組織人民公社為時早些，農業高級合作社剛成立不久，需要時間發展、過渡，現在一步登天，行嗎？對糧食產量瞎估計，生產指標定得那麼高，不顧實際，一些神話般的奇跡也出現了，人們憂心忡忡。」（註一三七）由此可見，當時彭德懷對「三面紅旗」是懷疑的。「北戴河會議」後三個月時間裏，「彭總去過部分地區視察，認為實際情況與計畫相距很遠，下面的領導竟把口號式的所謂『高產』當做實際指數報給中央，欺騙中央，大搞浮誇風。」（註一三八）事後，彭德懷曾坦承說：「五八年大躍進，工農業齊進，但在完

成生產產量上，我是有懷疑的……」（註一三九）此外，彭特意到湖南一帶的農村去實地調查，親眼目睹廣大農村到處都是「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過？」的慘象，彭德懷決定：「我不能沉默了，我要當海瑞。」（註一三〇）

站在毛澤東的立場，毛不可能不知道黨內有些人對「三面紅旗」運動存有異議。（註一三一）而彭德懷再三提出反對的意見，也招致毛澤東的批評，當時毛對彭已有相當深的成見，由毛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已可嗅出毛對彭的不滿。當初毛澤東在「十大元帥」中挑出彭德懷來當首任「國防部」部長，除了兩者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外，或許彭也是蘇聯當局所能接受的中共「國防部」部長的人選。尤其是在蘇聯大力軍援中共期間，中共當局也需要一個能與蘇聯配合的「國防部」部長，這也是彭在「十大元帥」中崛起出掌「國防部」的背景。可是，彭德懷的一些作法可能早已引起毛澤東的不快，在一九五三年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條例（草案）」中原規定：「黨委員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然彭德懷在修改時全部加以刪除。（註一三二）此外，在一九五六年「八大」召開時，彭德懷又是首先提出從黨章中「劃掉毛澤東思想的」。（註一三三）彭德懷的這些舉措實已觸犯了毛澤東，當中蘇兩共關係未呈現危機時，彭的政治地位尚稱穩固。可是自一九五八年開始，毛澤東指示共軍「總政治部」發動全軍整風運動時，彭德懷的政治地位已明顯下降，加上「八二三砲戰」又使中蘇兩共的關係產生裂痕，這一系列發展實已註定彭被罷黜的命運。換句話說，毛澤東早已伺機準備整肅彭德懷，而「廬山會議」剛好就是這個機會。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前，中共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彭總會與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等同志交流過意見，一致認為目前的政策不合實際，但找不出說服決策者的理由，彭總慨嘆道：『建業難，守成更難？』」接着在「武昌會議」期間，彭在一天深夜驅車前往毛澤東下榻的別墅，「主席一見彭總，就說：『彭大將軍，三更半夜找我，當然有急事，看你這幾天來悶悶不樂，是想不通吧！』彭總直言不諱地答道：『是想不通。』」接着，彭總把自己所掌握的情況和看法通盤說出。主席聽完後，笑着說：『那麼嚴重嗎？口號是喊的響亮些，個別地區有過分的現象，總的來說還是增產，有進步就有希望，為什麼你看不到這點？！近來，我們與蘇共的關係已呈緊張，估計他們下一步會從經濟上卡我們，逼我們就範，聽他們的，將

走向死路，現在唯有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走自己的路，時不我予啊！我們要搶時間，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要支持人民羣衆的積極性，不要潑冷水，要顧及大局啊！」彭總知道了意見不能採納，怏怏然離去。」事後，彭德懷對馮恩來表示：「錯誤的東西我不支持，不從實際出發，急氣用事，六億五千萬人民跟着我們走，責任重大，可避免的錯誤不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何向人民交待。總理，你不便說，我可要說，不惜罷官！」（註一三五）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昌會議」上復決定毛澤東不作下屆「國家主席」的候選人。（註一三五）可是，毛仍任黨主席，繼續推動「三面紅旗」運動。

「武昌會議結束後至上海會議（一九五九年三、四月間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立即召開「八屆七中全會」）召開的四個月期間內，彭總經常抽空到一些地區做實地調查、觀察，對愈演愈烈的「共產風」、「浮誇風」深表憂慮。」「上海會議」後，彭德懷回到北平，火氣很大地對黃克誠說：「主席在會上批評了我，原因是我講了實話。說我右傾，我不承認，更不能接受。事實擺在眼前，拒不承認，又要推卸責任，硬充英雄好漢，算什麼共產黨人？明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發作，簡直是拿人民開玩笑嘛。主席不信任我了，現在也用不着我這個大老粗了，忠言逆耳，令人心痛，我不配當國防部長，解甲歸田好了。好多同志勸我不要提此事，人民受苦，我這個國防部長有什麼好當頭？！有愧人民啊！我寧願回家種田，這樣心安理得些。」（註一三六）由此可見，當時彭德懷對毛澤東也已相當不滿。

「廬山會議」召開前，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先在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針對我黨在工作中存在的錯誤、缺點，鼓舞到會的同志批評、提意見，並宣佈「不戴帽子」，主席的態度激勵了大家，不少同志發表了「反左傾冒進主義」的意見，連怕事的張聞天同志也踴躍發言。」「主席的態度完全出乎彭總的意料之外，……在會上，彭總誠懇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分析，肯定了成績。對盲目的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虛構的農業高額豐產運動，得不償失的羣衆大辦鋼鐵運動，被羣衆反對的「吃飯不要錢的食堂」等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彭總針對黨內缺少民主的時弊，提出要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獨裁的意見。彭總的意見受到與會的同志的熱烈歡迎。」（註一三七）面對彭德懷的責難，毛澤東並未立即發作，事後毛說：「……聽不得怪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就是硬着頭皮頂住聽，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怪。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一肚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

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頂住，聽他一、二個星期，再反擊……」。(註一三八)不過，七月十日毛澤東却已對「三面紅旗」運動定下了基本調子：「要承認缺點，錯誤，從一個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九個指頭，或者三個指頭，二個指頭。但是從全局來講，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從總的形勢來講，就是這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註一三九)可是，彭德懷似乎沒有警覺到毛澤東正在部署反擊，「七月十四日，彭總向主席呈送了意見書，具體論述了自己的觀點。七月廿一日，張聞天同志在小組會上做了措詞激烈的發言，深刻批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給黨和人民帶來的危害……」

(註一四〇)七月廿三日，毛澤東反駁說：「……我看現在羣衆和我們合作的很好。……這種廣泛的羣衆運動，不能潑冷水……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份子……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卽一億五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食堂、攪大協作，非常積極，他們願攪，你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此外，毛澤東警告說：「……我勸另外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緊急的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搖擺的，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邊？向那一方面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就是動搖的，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決的。」(註一四一)結果，「會議峯迴路轉，原旨在反左突然變成了反右。八月二月匆忙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批判所謂『彭黃反黨集團』，許多同志對此事大表愕然。當時，我（按：黃克誠）、張聞天、周小丹、洪學智、蕭克、鄧華、周炳、滕代遠等同志在公開場合中曾表示支持彭總的觀點，被毛主席指責爲『軍事俱樂部』。彭總憤慨地對朱總（按：朱德）說：『什麼軍事俱樂部？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天大的責任由我彭德懷承擔，與其他同志無關，根本沒有組織存在，他們是冤枉的。』」(註一四二)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抨擊說：「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上提出意見，更不在北戴河會議上對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今年一月北京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二月鄭州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會議上提出意見，而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提出意見。」「這些同志爲什麼不在那時候提，而在這個時候提？因爲他們的一套，那時提不出。如果他們有一套正確的見解，比我們高明，在北戴河就提竊！他們等到中央把問題解決了或

者大部分解決了才來提，認為這時不提就不好提了。因為他感覺現在不提，再等幾個月以後，形勢更好轉，時機過了，就更不好了，故急於發動。」（註一四三）更令毛澤東惱怒的是，「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註一四四）居然，彭德懷也和赫魯雪夫相互呼應，攻擊「三面紅旗」運動，日後毛澤東對黨內警告說：「絕對不可以背着祖國，裏通外國，同時我們也不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國的挑撥……」（註一四五）這也是「文革」時期，彭德懷慘遭批鬥的一大罪名。（註一四六）當然，彭德懷不可能賣身投靠蘇聯，不過在十大元帥中，彭倒是最親蘇者，在彭發表的講話及文章中，找不出反蘇的字眼。此外，彭德懷「他把我軍裝備的改善和尖端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全依附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作法（註一四七），也招致了十大元帥中如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及大將粟裕等人的不滿。（註一四八）在中蘇兩共關係呈現裂痕之際，中共第一代職業軍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隨之高漲，而加劇了對彭德懷的不利氣氛。

必須指出的是，「廬山會議」不過是毛澤東借題發揮，趁機整肅了彭德懷、黃克誠等人，彭、黃被打成「反黨集團」，冠上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罪名，其實這些都是欲加之罪，毛整肅彭的真正原因仍是槍桿子問題。毛澤東說彭德懷的信是「招兵買馬」「有野心」，毛再度施展他的「虎氣」揚言說：「中國人民解放軍要跟彭德懷走，我就得打游擊。」（註一四九）「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紅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註一五〇）因此，在「廬山會議」上通過的「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事件的決議」曾特別指出：「由於彭德懷在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的地位，也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能夠迷惑一些人的並且已經迷惑一些人的，對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前途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的。」（註一五一）筆者認為，這才是彭德懷獲罪罷官的關鍵，毛澤東的原始動機也昭然若揭。（註一五二）

「廬山會議」後不久，毛澤東隨即於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又在北平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反黨罪行」和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會後，全軍各大單位召開幹部會議，批判彭、黃的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本單位的所謂「右側機會主義份子」。九月十七日，林彪取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部長，並開始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註一五三）

結 語

林彪上臺後不久，隨即發表「高學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一文，該文以不點名方式批判彭德懷說：「有些同志就以爲經濟建設如國防建設有所分工，軍隊的訓練任務又很繁重，似乎軍隊可以不必參加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和國家經濟建設，可以不必參與『地方上』的事了。」「有些同志把參加羣衆運動，幫助人民生產看成爲一種額外負擔，認爲只有出操上課才叫訓練，參加社會主義鬥爭的實踐就不是訓練，反會妨礙訓練，就是『得不償失』。」林彪在該文中指出：「我們及時地批判並堅決地糾正了這種錯誤觀點，繼續發揚了長期以來我軍既擔任打仗、又做羣衆工作、又參加生產的三大任務的光榮傳統，並且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不同時期的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了支持羣衆運動的活動。」此外，林彪在該文中再度強調說：「在我軍的現代化建設中，我們自然要十分注意改善裝備、掌握技術，但是一定還要注意另一方面，而且是主導的一面，這就是不要忘記政治，要強調政治。我們的軍隊是爲政治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軍隊，我們要用政治指導軍事，用政治指導日常工作。政治是根本的東西，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都無從談起。」（註一五四）由林彪發表的這篇文章可以明顯看出，林彪只是老調重彈而已。毛澤東培植林彪來取代彭德懷，揆其用意，主要仍是利用林彪肅清彭德懷在軍隊逐漸醞釀成氣候的勢力，以免一派獨大，而形成尾大不掉的現象，進而威脅到毛澤東對於槍桿子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廬山會議」後，當時中共並未公佈關於「彭德懷事件」的決議，對於彭德懷的批判也採取不點名的影射方式，直至一九六一年共軍「總政治部」的秘密文件——「工作通訊」中才提出要「肅清彭、黃錯誤路線的影響」，將彭德懷任內所推行的一系列建軍政策打成「錯誤路線」。（註一五五）「文革」爆發後，中共又重翻老案，於一九六七年八月間，首次公開發表了「廬山會議」中「有關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此外，「解放軍報」的一篇社論也露骨地批判說：「黨的廬山會議所揭露的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借着他們在軍隊所竊據的重要職務，力圖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取消政治工作，取消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做羣衆工作的任務，取消地方武裝和民兵，從根本上否定毛主席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思想。」（註一五六）這些發展充分顯示，彭德懷被整肅的導火線就是軍隊的角色問題。

註 釋

- 註 一：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一四六九。
- 註 二：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六。
- 註 三：「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國慶節慶祝大會上的報告：爲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鬥」（節錄）（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朝鮮問題文件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一八三。
- 註 四：引自楊勇，「志願軍八年抗美援朝工作報告」（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黃遠之編著，「中共軍事戰略文獻彙編」，（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頁三〇一。
- 註 五：See David Rees, e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and Tactics* (London: Orbis Publishing, 1984)
- 註 六：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2.
- 註 七：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Final Testament*, trans.,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69.
- 註 八：Jonathan D. Pollack, *China as A Military Power*, in Onkar Marwah and Jonathan D. Pollack, ed., *Military Power and Policy in Asian States: China, India, Japa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p. 45.
- 註 九：「工人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
- 註 十：Ellis Joffe, *op. cit.*, p. 12.
- 註 十一：「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匪軍事著作摘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印，民國五十七年），頁二四五。
- 註 十二：同註十一，頁二四四。
- 註 十三：同註十一，頁二四三。
- 註 十四：同註十一，頁二四四。
- 註 十五：同註十一，頁二四四。
- 註 十六：同註十一，頁二四六。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銜突演變之研究

- 註十七：彭德懷，「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黃達之編著，「彭德懷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頁二六五。
- 註十八：毛澤東，「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頁四七四至四七五。
- 註十九：同註十八，頁四七五。
- 註二十：同註十八，頁四七六。
- 註二十一：同註十八，頁四八六。
- 註二十二：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增訂版）頁一一。
- 註二十三：同註二十二，頁一一至一二。
- 註二十四：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增訂版），頁二二二。
- 註二十五：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 註二十六：同註二十五。
- 註二十七：同註十一，頁二四三。
- 註二十八：Alexander Georg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A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61, 188-189.
- 註二十九：同註十一，頁二四五。
- 註三十：John Gitting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aps. 6, 7.
- 註三十一：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ilitary Policy*, in Frank Horton III, Anthony C. Rogerson & Edward L. Warner III, eds., *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18.
- 註三十二：Alice Langley Hsieh, *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2), pp. 37-40.
- 註三十三：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思想萬歲」，頁四六。
- 註三十四：同註三十三，頁四六。
- 註三十五：同註三十三，頁四五。
- 註三十六：彭德懷，「建設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保衛祖國和平建設」（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黃達之編著，「彭德懷評像」，（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頁三二〇至三二六。
- 註三十七：皮明麻，「關於『八七會議』的幾個問題」（原載「近代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四期），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中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四〇。
- 註三十八：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增訂版），頁二八二至二八七，三三八。
- 註三十九：同註三十七，頁三五。
- 註四十：引自葉劍英，「建軍五十周年」（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黃達之編著，「中共軍事戰略文獻彙編」，（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頁三四六。
- 註四十一：「秋收起義」，「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 註四十二：羅榮桓，「秋收起義和我軍初創時期」，「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 註四十三：「毛委員指示在工農革命軍的每個連隊都要建立一個士兵委員會。它設主任一人、委員五至七人，均由全連官兵選舉產生。它既是民主組織，又是監察機關。有什麼事，士兵委員會就召集大家討論，上至各級首長下到伙夫，都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力。有批評有表揚，賞罰嚴明，官長和士兵都一樣，一點不馬虎。」見「毛委員在井崗山」，（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七月第一版），頁一八。「……三灣改編中，在軍隊內部實行了民主制度，連以上各級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參加軍隊的管理；維護軍隊的紀律；監督軍隊的經濟；做新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羣衆工作。」見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寫作組編寫，「井崗山革命根據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一版），頁二一。
- 註四十四：毛澤東，「井崗山的鬪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五九至八六。
- 註四十五：同註四十二。
- 註四十六：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一三至四六。
- 註四十七：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頁五八四至六一七。
- 註四十八：同註三十七，頁二一至四五；同註三十八，頁二八二至二八七。
- 註四十九：同註四十三，見「井崗山革命根據地」，頁二六。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 註五十：同註四十三，見「毛委員在井崗山」，頁二九。
- 註五十一：同註二十五。
- 註五十二：同註四十四。
- 註五十三：黃少羣，「有關古田會議兩個問題的研究」（原載『教學與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中冊，頁四四七至四六一。
- 註五十四：同註五十三。
- 註五十五：蕭克，「偉大的建軍綱領——回憶古田會議」，「紅旗」雜誌，一九七九年第八期，頁二至一五。
- 註五十六：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頁二九至四三。
- 註五十七：同註五十三。
- 註五十八：出註五十五。
- 註五十九：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八七至九九。
- 註六十：同註四十二。
- 註六十一：同註四十二。
- 註六十二：同註五十六。
- 註六十三：江國欽，「指導建黨建軍的重要歷史文獻——學習『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的一點體會」，「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九日。
- 註六十四：毛澤東，「把軍隊變成工作隊」（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一四〇七至一四〇九。
- 註六十五：同註六十四。
- 註六十六：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35.
- 註六十七：毛澤東，「關於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毛澤東思想萬歲」，頁一。
- 註六十八：同註九。
- 註七十：同註九。
- 註七十一：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頁五三五。
- 註七十二：同註九。

註七十三：同註九。

註七十四：「解放軍報」，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註七十五：「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整風文獻」訂正本，（延安：解放社，一九四三年六月），頁一三九至一四八。

註七十六：Roderick Mac Farquhar ed.,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 1966), p. 45.

註七十七：毛澤東，「關於健全黨委制」（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一三四三。

註七十八：John Gittings, "Army-Party 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John Wilson Levis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81.

註七十九：「解放軍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七月一日。

註八十：「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註八十一：劉亞樓，「認真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解放軍報」，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註八十二：「解放軍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九日。

註八十三：Ellis Joffe, "The Conflict between Old and New in the Chinese Army", in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64), p. 130.

註八十四：Ellis Joffe, "The PLA in Internal Politics,"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iv, (November-December, 1975), p. 3.

註八十五：同註九。

註八十六：「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八十七：香港「大公報」，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註八十八：「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日。

註八十九：「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註九十：「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註九十一：「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註九十二：同註八十六。

註九十三：同註八十六。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註九十四：同註八十六。

註九十五：同註九。

註九十六：江一山，「中共的兩條軍事路線」，「祖國月刊」，一九六八年七月號，頁五至一四。

註九十七：「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

註九十八：「解放軍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

註九十九：「解放軍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二日；also see John Gitting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60-161.

註一〇〇：「解放軍報」，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

註一〇一：「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註一〇二：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第三卷）（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香港；明報月刊社，一九七一年），頁一九六至一九九。

註一〇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主要事件簡介」（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九三。「文革」爆發後，由韓戰到一九五八年的軍委會議被視為軍內的第一次大的鬭爭。「第一次大的鬭爭，是從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開始的。一小撮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打着『正規化』、『現代化』的幌子，全盤照搬外國的一套，妄圖否定我軍的歷史經驗和優良傳統，把我軍引上資產階級軍隊的道路。……一九五八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在毛主席提出的『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號召下，粉碎了他們的猖狂進攻，捍衛了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和建軍路線。」見「把我軍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日後中共承認：「這次會議對建軍工作中的所謂數條主義傾向進行了不適當的過火批判，致使後來人民解放軍的正規訓練和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影響。」見「中共黨史主要事件簡介」，頁九三至九四。

註一〇四：「新華月刊」總第一四一期，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

註一〇五：「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

註一〇六：James D. Jordan, *The Maoist vs. The Professional Vision of A People's Army*, in William Whitson, e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in the 1970's* (New York: Praeger, 1972), p. 32.

註一〇七：同註八十六。

註一〇八：同註六十七。

註一〇九：「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

註一一〇：「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

註一一一：同註一一〇。

註一一二：「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一一三：武漢「長江日報」，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

註一一四：清華井崗山，「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軍閥彭德懷罪惡史」，丁望主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三卷」——「彭德懷問題專輯」，（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一九七九年二月增訂二版），頁三八九至三九〇。

註一一五：傅秋濤，「大辦民兵師」，「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

註一一六：同註一一五。

註一一七：同註一一五。

註一一八：同註一一五。

註一一九：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澤東思想萬歲」，頁二六五至二六六。

註一二〇：「工作通訊」第四期，頁一九。

註一二一：「工作通訊」第二十三期，頁三。

註一二二：同註三十七，頁三五。

註一二三：Harlan W. Jencks, *China'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1949-1980*, in Morris Janowitz, ed.,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Regional Perspectives* (Berkele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1), pp. 125-126.

註一二四：Franz Schurmann, *op. cit.*, p. 567.

註一二五：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訪問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頁三〇五。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在北平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指出，「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驕傲自滿，急於求成」，「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主要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見「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註一二六：鄧小平，「鄧小平文選」，頁二五九。

註一二七：黃克誠，「請還彭德懷同志清白」，「匯集重要講話彙編」內，（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六十九年元月），頁一四九至一五四。

註一二八：同註一二七。

註一二九：「彭德懷的『檢討』」，「文革」爆發後，彭德懷被扣押審訊，這是紅衛兵報刊透露的材料，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期間，彭德懷遭到看押時的「審訊記錄」。參見黃達之編著，「彭德懷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頁一四一至一四三。

註一三〇：同註一二九。

註一三一：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合作化問題，有人主張快一點，有人主張慢慢來，我認爲前一種好，還是趁熱打鐵，一氣呵成好，不要拖拖拉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透露：「一九五六年砍掉了個東西——多快好省，促進派，四十條。有三種人三種心理狀態，一種是痛心的，一種是漠不關心的，再一種是砍掉高興的，一塊石頭落地，從此天下太平。這三種態度的人，兩頭小中間大。一九五六年有許多問題都有三種態度。反日、反蔣、土改是比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問題上有這三種態度，這種估計是不是對？」由毛澤東的講話可知，當時中共黨內有些人對於「三面紅旗」運動是有懷疑的，也有些人是反對的。參見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頁一六二，頁一八六至一八七。

註一三二：黎新功，「徹底清算彭德懷篡軍反黨的滔天罪行」，「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註一三三：同註一二九。

註一三四：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五：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一三六：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七：同註一二七。

註一三八：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頁二一二。

註一三九：毛澤東，「廬山會議前後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八月十六日），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頁二二〇。

註一四〇：同註一二七。

註一四一：同註一三八，頁二一〇，二一二。

註一四二：同註一二七。

註一四三：同註一三九，頁二二一。

註一四四：同註一三八，頁二一六。

註一四五：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上和外事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頁二四八。

註一四六：「……他的外國主子赫魯曉夫會不止一次地公開說：反黨份子彭德懷是他的『好的朋友』，贊揚他反對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有足夠的勇氣』，『是正確的勇敢的』行動。在這裏彭德懷裏通外黨的罪行不是昭然若揭了嗎？」見空軍司令部紅戰兵，「徹底清算彭德懷篡軍、篡黨、篡國的滔天罪行」，「光明日報」，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彭德懷的反黨活動，不僅有中國赫魯曉夫作後臺，而且有蘇聯的赫魯雪夫撐腰打氣。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跳出來以後，蘇聯赫魯曉夫就公然無恥地吹捧彭德懷是『正確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實十分清楚，彭德懷就是配合赫魯雪夫現代修正主義者，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裏通外黨份子。」見「彭德懷及其後臺罪責難逃」，「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註一四七：同註一三二。

註一四八：Alice Langley Hsieh, *op. cit.*, pp. 37-40.

註一四九：同註一二九。

註一五〇：同註一三八，頁二一三。

註一五一：「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事件的決議」（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黃達之編著，「彭德懷評傳」，頁一八四至一八五。

註一五二：在「廬山會議」中被整肅的「彭、黃反黨集團」，被稱為「建國」以來的第二次大鬭爭。「第二次的鬭爭，是和一九五九年我們黨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鬭爭同時進行的。黨的廬山會議所揭露的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藉著他們在軍隊竊據的重要職務，力圖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取消政治工作，取消軍隊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和做羣衆工作的任務，取消地方武裝和民兵，從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思想。他們妄想按照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軍事路線，改造我們的軍隊，使軍隊變成他們篡黨、篡政，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整黨的廬山會議之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徹底清算了他們的罪行，罷了他們的官。」見「把我軍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

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共軍內衝突演變之研究

日。

註一五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中共黨史主要事件簡介」，頁一一六。

註一五四：「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一日。

註一五五：「工作通訊」第五期，頁五。

註一五六：「解放軍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